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人物关注

彭士禄：

核动力领域的拓荒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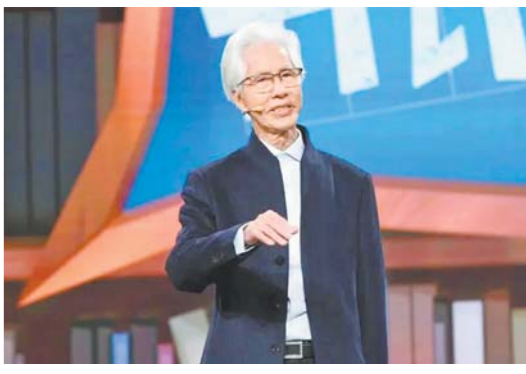
伴随着激昂的《英雄核潜艇》之歌，可降解的环保型骨灰坛被慢慢放入海中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骨灰坛将融化在大海中。

丧事从简；不留骨灰，海葬；骨灰撒在工作多年的葫芦岛海域。这是享年96岁的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生前嘱托的三件事。

(科技日报)

何镜堂：

用作品记录时代



“好看的直线不一定要像尺子那样笔直，你细看，它有戏的。”不少建筑设计师常随身带着纸笔，一有灵感就拿出来画房屋结构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何镜堂就是如此。

已是“80后”的他，依然身姿挺拔、气质儒雅。在他80岁生日宴上还可以表演“两只手要三个苹果”的绝活儿。

上海世博会中国馆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，钱学森图书馆，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馆……何镜堂的代表作遍布大江南北。

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的尾厅，何镜堂及其团队设计安放了一个独具匠心的装置：幽暗的角落里，每隔12秒就有一颗“水珠”落下，与此同时，旁边的墙壁上亮起一张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照片，然后消隐，寓意每隔12秒就有一个鲜活的生命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，滴滴答答的钟摆声昼夜不停歇。

从高空俯瞰整座纪念馆，它又像一艘破浪前行的和平之舟。穿过雕塑“冤魂的呐喊”步入广场，广场上铺满的砾石会发出被挤压摩擦的声音，仿佛历史的回响。

(央视网)

李玉：

构建全新菌物系统分类体系



“搞农业科研的，不能帮着农民致富奔小康，不能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专业优势，那还叫什么科技工作者？我总告诉学生一定要到生产实践中去锻炼。”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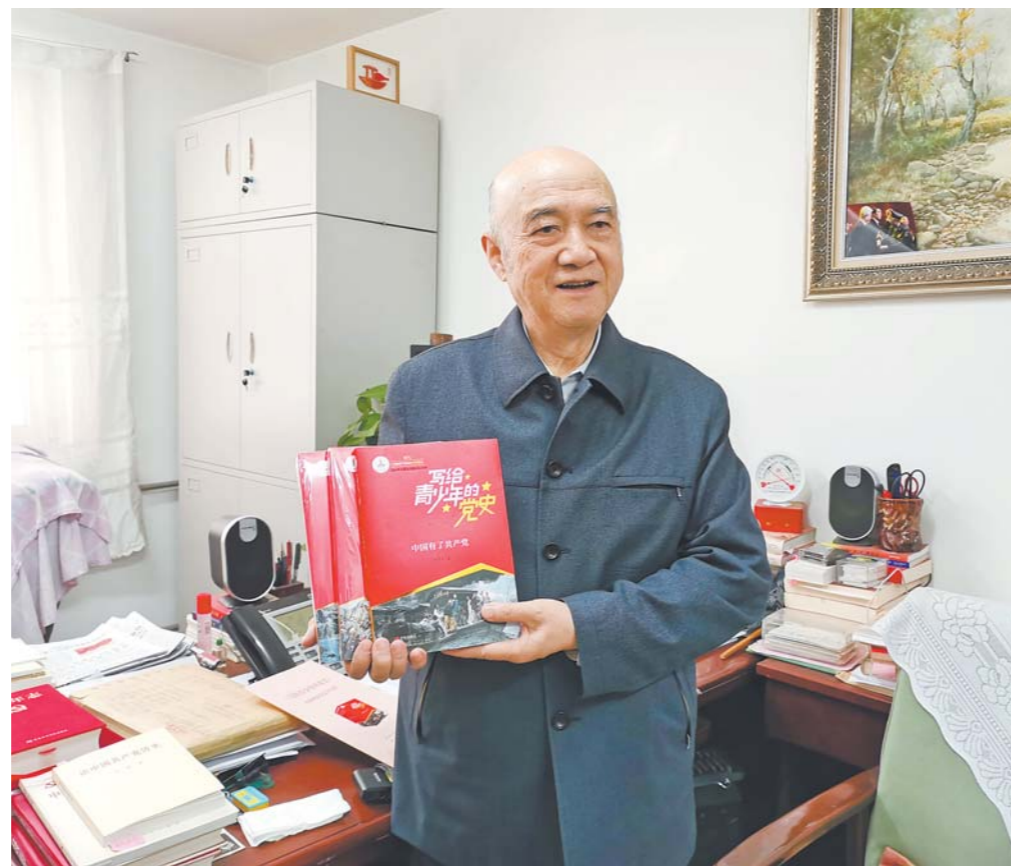
他深耕菌物科学和工程产业化研究40余年，构建了全新的菌物系统分类体系，并带动上千万贫困户依靠食用菌脱贫致富。

40多年来，李玉经历见证了我国食用菌产业从简陋的地沟、菇棚到花园式的基地；从传统的庭院式生产到现代化的工厂化生产发展过程。吉林汪清、浙江庆元、山西临县、贵州铜仁、河北阜平……“木耳院士”和他的团队在全国40多个贫困县(市)留下足迹，建立食用菌技术推广基地31个，扶持食用菌龙头企业22个，示范推广60亿袋，带领农民精准发展食用菌特色产业。

(经济日报)

邵维正：深耕党史五十年

□ 本报记者 李梦馨



上图：邵维正展示《写给青少年的党史》

□李梦馨 报道

下图：《写给青少年的党史》系列丛书



少年从军，奔赴战场；中年转向党史研究，活跃于书斋和讲台之间，研究讲学两不误；年岁愈长，致力于党史的普及——在党史研究和教学的路上，邵维正走过了五十多个年头，至今仍步履不停。

少年从军，奔赴战场

1951年，春天，浙江。

“小鬼怕死不怕死？”  
“不怕！”  
“怕苦不怕苦？”  
“不怕苦！”  
“不怕死不怕苦你就来！”

经历了一番简短的问答后，年仅15岁的邵维正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当时规定的最低参军年龄是16岁，邵维正头一回报名时不了解，因为年龄不够被拒绝了，这次他便有意多报了一岁。

那时候，新中国刚成立不久，见证了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、建立新中国的青年人，满腔热血。跟着党走，成为当时青年人的一个“时尚”。“到处都在唱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好喜欢。”说着，邵维正忍不住动情地唱了起来。

美军的飞机已经飞过了鸭绿江，如果朝鲜守不住，战火势必烧到东北，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”已成为当时人民的共识。在爱国主义热情的感染下，邵维正没念完初中，就毅然离开了书桌案头。在浙江守了一段时间的海防后，第二年，他转入志愿军序列，跟随所在的62师北上奔赴朝鲜战场。

一进入朝鲜的领土，映入邵维正眼帘的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。铁路、公路两边几乎看不到一栋完整的房子，全被炸毁了，邵维正被触目所及的战争场面深深地震撼着。

由于军事实力悬殊，美军掌握了绝对的空中优势，为了防备敌军的轰炸，邵维正跟战友们隐蔽在弯弯曲曲的坑道里，听着炸弹爆破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。

战场上条件艰苦，就着冰雪吃炒面是常见的饮食，但雪水冰凉，吃了不免闹肚子。邵维正就先把冰雪含在嘴里，用体温“加热”，等到冰雪化成水，再吞咽下去。在这样极其艰难的处境下，邵维正迅速成长。

他在朝鲜战场上待了6年，1956年9月，在朝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60多年后，再度回想起这段经历，邵维正感慨良多，“在我的一生经历当中，抗美援朝这几年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，对自己的一种考察，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思想上的升华。”

中年转行，考证中共一大

1978年冬天，全军院校恢复招生，军校大量从作战部队调人。时任师部宣传科科长的邵维正，被调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教员，此后，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党史研究教学工作。

就在同一年，由胡乔木牵头的12卷大型历史巨著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》项目启动。新中国是经过流血牺牲打出的红色江山，因此，胡乔木提出，这套书光靠文人写还不够，要从军队里找几个专家。就这样，军人出身的邵维正于1979年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，参与撰写该套丛书第一卷《伟大的开端》中的第二章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”。

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性事件，中共一大是永远也绕不开的起点。从1941年开始，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的时候，通常把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，很多人就此理解为7月1日是一大召开的时间。

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邵维正在起草初稿的时候，发现了问题，仅仅关于召开时间，就有1921年7月1日、7月4日、7月5日等着不同的说法，关于出席人数同样众说纷纭。由于一大属于秘密状态下召开的会议，加之年岁久远，一大的召开日期、出席人数等，都成了一桩桩“悬案”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，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精神逐渐在各个领域落地生根。“党史研究更是马虎不得，每个细节都得准确，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问题必须得搞清楚。”邵维正说。

那个年代没有电脑，所有资料都得亲自找，邵维正几乎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和资料室。中央档案馆、中央党校图书馆、北大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等地方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

到了晚上，他就归类整合白天搜集来的资料，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。那段时间，考证一大成为邵维正唯一的目标，其他的什么事情都顾不上，他经常两三个星期才回一次家。

到最后，他整理的资料卡片已经有上千张，堆起来有1米多高。根据这些资料卡片，邵维正制成了一张“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”，详列了几十种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时间的说法。

做考证工作，光靠“死”证据不够，还得找一些“活”资料。于是，邵维正寻访时还健在的参会人员，他了解到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曾在一大召开期间做过会务，就几经周折找到了老人的住处。当时王会悟老人已经82岁，身

体不太好，躺在床上接受了邵维正的采访。

各种资料收集起来，已有几十万字。如何从纷乱的资料中理出个头绪来，邵维正决心从考证一大代表的行踪入手。他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找到了谢觉哉日记的原件，里面记载着：“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，偕行者润之，赴全国○○○○之招。1921年6月29日特记。”后来谢觉哉解释，五个圈所对应的字是“共产主义者”，因当时反动势力猖獗，又怕忘记，故以圈代替。

据此，邵维正查找了当时从长沙到上海的班次，按最快到达的日期算，何叔衡和毛泽东的到达日期应该在7月4日以后。由此，排除了7月1日开会的说法。

在一次又一次的走访中，他从当年参加过一大的刘仁静老人那里得知，原来当年刘仁静先去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，之后才去上海参加的一大。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由李大钊等人发起的进步社团，为了找到这次会议的记载，邵维正跑遍了各种图书馆、资料室，寻找该学会的会刊《少年中国》杂志，但都没有结果。

后来，经多番打听，邵维正来到了中央党校图书馆库房。因为怕打湿资料，进库房的人是让不带水的。当时恰逢酷暑天，邵维正就冒着高温，在一排排书架之间来回穿行寻找。空间逼仄，转个身都困难，他挨个书架看，一本一本找，一页一页翻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《少年中国》原件。

随着考证的深入，一大的召开时间渐渐锁定在7月20日、23日和24日这三天上。这时候，一份来自苏联的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》的记载引起了邵维正的注意。这份记载提供了几个关键信息：报告采用“我们”字眼，说明是参会者提供；开会时间接近“23”日或“24日”；明确会期为8天；记录了“侦探闹会”的史实。

当时的《上海生活报》《申报》等报纸上，都报道了7月30日晚法国巡捕房搜查会场的事件。周佛海、陈公博的回忆录也有相应的佐证。种种证据都将一大最终会期指向7月30日，根据苏联档案记载的会期，再往前推8天，就将一大开幕时间确定在7月23日。

此外，邵维正还考证了一大的出席人数，关于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专题论文发表在内部刊物《党史研究资料》上。1981年1月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创刊号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刊登了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》。

文章发表后，全国几十种报纸杂志进行了报道或转载，该文还被译为英、日、俄、法等文字在国外多种刊物发表，海外学者称其为“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开端”。胡乔木评价，“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力气，弄清了十几年悬而未决的问题，这是党史研究的一项突破性成果。”

老年转向，致力党史通俗化

从一大考证这个起点开始，邵维正党史研

究的面渐渐开展开来。有人评价他，是由“红色的起点”走向“红色的世界”。

1991年，正值建党70周年，邵维正主编的《中国共产党创建史》出版，以30余万字的篇幅，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，着重介绍建党的过程、意义和影响，填补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空白。

从党的创建到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、改革开放新时期，从党史研究到党的创新理论、军队政治工作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，邵维正一步一个脚印，不断推进党史专业化研究。

随着研究的深入，邵维正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我们写党史书是给谁看的？“全国从事党史工作的一万多人，可是读党史的有几亿人。我在想，我写党史是给一万人看，还是给几亿人看。”邵维正说。

近20年来，邵维正一直在追求党史的通俗化写作。2001年，建党80周年之际，邵维正主编了《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》，这部书用100件大事、1000张图片，图文并茂地解说党的80年历史。随后，建党90年时推出的《中国共产党90周年创新实录》和《日出东方——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》，都以通俗化的风格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。

进入新时代以后，邵维正想得更多的问题是，怎么能写一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党史，让青少年能够更好地接受党的传统、传承红色基因？这个想法一直深埋在邵维正心里，直到2018年，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，想法终于落地。

当时，青岛出版社正在策划出版一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党史读物，他们从2017年开始，就在沟通国内的党史研究专家学者。编辑刘克东从央视《百家讲坛》节目中了解到邵维正，他主讲的《党史故事100讲》给刘克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邵维正在接到青岛出版社的电话后，十分惊喜，因为这与他此前的设想不谋而合。当时他手头上还有几家出版社的邀约，但考虑再三后，最终答应了青岛出版社的约稿。

一开始，邵维正和团队想做一套规模比较大的适合青少年的党史历史丛书，分四个时期，每个时期有的人物、事件和专题，这样排下来一共有12卷。但如此大的体量，青少年能读下去吗？邵维正团队跟出版社协商之后，推翻了之前的方案，重新组排，决定以问题切入，也就形成了《写给青少年的党史》目前的样貌。

“既然是写给青少年的，我们就要关注青少年的认知特点，他们往往从感性出发，喜欢看一些生动、活泼的历史故事，所以我们就没有采取章、节、目的体系，而是抓住青少年在学习当中的难点、疑点，突出重点，设置了60个问题。”邵维正说。

这60个问题大体上按照历史顺序往前推进，每一个问题独立成章，连起来就是党的发展历史。60个问题编成6本书，第一本书是《中国有了共产党》，最后一本是《筑梦新时代》。从《中国有了共产党》到《筑梦新时代》，基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程。